

# 陳增福家族菁英群與臺北高等學校初探\*

蔡錦堂\*\*

## 摘 要

陳增福為臺北艋舺人，出身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短期擔任學校教員後，赴日本明治大學就讀法科，通過日本司法省「辯護士試驗」（律師考試）後，回臺執行辯護士業務。其娶臺灣人與日本人妻子各一，並於一般臺灣人尚未能取得日本姓氏的1931年，即已改姓名成為「穎川增福」。陳增福家族共有子女18名，9位男生中有5人先後進入當時號稱「臺灣高等教育最大難關」的「臺北高等學校」就讀，另外還有1位就讀於「臺北帝國大學預科」。單一家族能有高達5位子弟擠進臺北高等學校，陳增福家族乃是唯一的例子。

陳增福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的家族為何能培育出這麼多的菁英？這在臺灣的教育史、家族史、社會史當中，到底呈顯了什麼意義？本論文藉著史料的耙梳以及口述訪談，來針對這些課題進行探討分析。同時，也對陳增福藉著與日本女性結婚的方式，取得「內地人」身份，而能於1931年即改姓名為「穎川增福」的特例，所衍生出來有關日臺通婚、戶籍法、國籍法的問題，進行初步考察。

關鍵詞：陳增福、穎川增福、菁英、臺北高等學校、改姓名、日臺通婚

\*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陳增福及其家族菁英群之研究」（計畫編號NSC100-2410-H-003-022）研究成果之一部分。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壹、序言

貳、辯護士陳（穎川）增福（1893.12.20~1977.5.1）其人其事

參、陳氏家族的臺北高校菁英群

肆、結論



圖一 陳增福家族照片（前排戴眼鏡者為陳增福）

資料來源：陳增福家屬提供

## 壹、序言

2009年6月5日臺灣師範大學於圖書館八樓新設立的「臺北高等學校資料室」揭幕時，前師大音樂系主任、也是2011年國家文藝獎得主的名聲樂家曾道雄教授與夫

人陳素珍女士亦前來參加，陳女士告訴筆者，她的父親是臺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而且父親的兄弟有許多人亦是臺高的畢業生。並未預期的這一次見面與對話，引起筆者莫大的興趣，因而展開了對陳女士父親兄弟與家族的追蹤。在經過與陳素珍（以下尊稱略）電話聯繫，以及8月中旬的拜訪、資料的蒐尋對照，筆者發現陳素珍父親陳定燦竟有五位兄弟曾經就讀臺北高校，包括：長男陳定燦（第10回理乙、1937年3月畢）、次男陳定松（第9回理乙、1936年9月畢）、三男陳定雄（第16回理乙、1942年9月畢）、五男陳定芳（第18回文乙、1944年9月畢）、六男陳定光（第20回理甲、1945年10月畢），<sup>1</sup>如果加上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四男陳定堯，一門竟有六虎屬於當時高等教育中的菁英群，而這一群菁英的父親即是戰前臺北市著名的「辯護士」（律師）陳增福（穎川增福）。

在目前筆者所掌握到的臺北高校菁英群裡，臺灣人或日本人之中（當時或用「本島人」、「內地人」稱呼，為解釋方便起見，本文權且使用臺灣人與日本人），並不乏兄弟檔就讀臺北高校的例子，例如：魏火曜與魏炳炎、郭琇璫與郭琇琮、辜振甫與辜寬敏、王育霖與王育德、楊思槐與楊思標、賴永祥與盧焜熙、楊雪樵與楊雪舫、梁炳元與梁大東、小田稔與小田滋，或日治五大家族顏國年家的顏滄波、顏滄浪、顏朝邦三兄弟，但是一個家族中高達五位子弟能擠進這個當時被稱為「窄門中的窄門」的臺北高校，陳增福家族可謂唯一。

陳增福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的家族為何能夠培育出這麼多的菁英？這在臺灣的教育史、家族史、社會史當中，到底呈現了什麼意義？筆者希望藉陳增福家族的菁英群研究，針對這些課題進行探討分析。

由於陳增福本人與就讀臺北高校的陳定燦等五位子弟、以及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陳定堯均已作古，訪談已是不可能，筆者乃藉著與陳氏家族的其他後代，包括：陳增福的女兒陳美、媳婦陳詹月娥（陳定光夫人）、長孫女陳素珍（陳定燦長女）、孫女陳愛蘭（陳定松女兒）的口述訪談，<sup>2</sup>佐以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日新報》、《臺法月報》、陳增福與陳定堯的訃文等等資料，來初步建構陳增福與

<sup>1</sup> 資料參照蕉葉會編，《蕉葉會名簿》（2005～2009年版），東京：蕉葉會，2004年。蕉葉會是臺北高等學校日本人（當時稱「內地人」）畢業生戰後於日本東京所成立的同學會組織。文中的「理乙、理甲、文乙」乃戰前臺北高校高等科分設文、理二科，再依主修外語不同而分甲、乙二類，甲類以英文為第一外語，德語為第二外語，乙類則以德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有關臺北高校，可參閱筆者，〈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外交部，2007年；或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sup>2</sup> 筆者於前年8月11日曾拜訪曾道雄、陳素珍夫婦，去年4月19日亦與臺師大臺史所的碩士班研究生潘郁雯、蕭君霖，對陳愛蘭、姜仁治（臺師大美術系退休教授）夫婦進行口述訪談；5月2日訪問陳詹月娥與其兒子陳秀浩（亞培公司經理）；5月23日口訪陳增福女兒陳美。

其家族菁英養成的情形，至於此研究個案在臺灣史中的定位與意義之深度探討，則留待日後繼續處理。

## 貳、辯護士陳（穎川）增福（1893.12.20~1977.5.1）其人其事

陳增福為臺北艋舺人，日本統治臺灣的前二年出生，四歲時父親過世，仰賴母親撫育成長，祖厝在艋舺入船町青山王宮附近（今貴陽街二段），家業似為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根據臺灣新民報所編《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穎川增福」項下記載，陳氏家族曾於明治39年（1906年）寄附鐵道用地二千餘坪給予臺北廳，而獲得廳長授與木杯一組予以表彰。<sup>3</sup>1906年時陳增福只是13、14歲的小孩，有能力寄附土地二千餘坪給予臺北廳，應可解讀為陳家在陳增福成為律師創業之前，早已是地方望族、地主，<sup>4</sup>陳增福雖幼時失怙，但家境應相當富裕。

陳增福與當時代的社會菁英一樣，公學校畢業後進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1914年畢業後，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訓導之身分，任職於艋舺公學校。<sup>5</sup>1918年5月通過該年度的總督府普通文官試驗，該年合格者計51名，「本島人」（臺灣人）通過者只有3人，以陳增福成績最優，在所有合格者當中排名第三。<sup>6</sup>

1919年陳增福辭去訓導之教職，轉到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任職，隔年即又辭職；1921年9月轉赴日本東京的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二年級就讀，<sup>7</sup>約一年半後的1923年1月，陳增福即在司法省舉辦的當年度「辯護士試驗」（律師考試）國家考試中合格通過，年紀是30歲。<sup>8</sup>當年通過辯護士試驗的臺灣人除了陳增福外，還有嘉義的賴雨若與新竹的蔡式毅。賴雨若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的通譯兼書記，30歲時立志當辯護士，於1907年11月進入日本中央大學準備辯護士試驗，歷經11回的考試，始於1923年如願成為辯護士，當時42歲。<sup>9</sup>1884年出生、比陳增福大約9歲的蔡

<sup>3</sup> 臺灣新民報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年，頁25。但另根據陳增福訃文中之「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記載，陳家捐贈之土地為北投至竹圍間的祖傳土地，計三千三百餘坪。未知何者較正確。

<sup>4</sup> 根據陳詹月娥的口述，她嫁到陳家時，住在萬華（原艋舺），曾被長輩叫去收房租「二十幾間」，陳增福的媽媽都說：「我們走路都不用過別人的土地」。2010年5月2日於陳詹月娥家之口述訪談（未刊稿）。

<sup>5</sup> 〈國語學校訓導陳增福艋舺公學校訓導職務取扱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2312，文號103，1914年4月1日。

<sup>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9日，6版。另二位通過之臺灣人為臺北地方法院通譯蕭祥安（40名），與何禮謙（51名）。

<sup>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6日，2版。

<sup>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月24日，2版。

<sup>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9日，7版。

式穀，同樣是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1903年），歷任新竹、桃園公學校教諭後，1912年辭職，赴東京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歷經十餘年苦學，於1923年考上辯護士。<sup>10</sup>相對於賴雨若與蔡式穀歷經十餘年始取得辯護士資格，陳增福一次考試即順利通過，《臺灣日日新報》以「一氣呵成」四個字來形容他。<sup>11</sup>唯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這一年的辯護士考試，報考者不到四千人，卻錄取了927人；「判檢事」（法官、檢察官）考試有三百多名應考者，通過者一百多人。該文撰稿者認為，或許由於制度將於隔年進行變革，考試要員因同情而多少有放水之嫌疑。不過無論如何，一次錄取三名臺灣人乃是破紀錄之事，當年朝鮮方面亦有11人合格。<sup>12</sup>

陳增福能以一年多的短暫時間熟記六法全書等法律條文，一次就通過考試，其聰明與毅力應不容置疑，何況當時他只是明治大學的學生，按時間，考試通過二個月後的該年3月，他才能自明治大學畢業。1923年3月4日陳增福自日本司法省取得辯護士合格證書，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10天後的3月14日陳增福即回到臺灣，<sup>13</sup>4月在臺北地方法院辯護士名簿登記後，迅即於臺北市太平町二丁目設立辯護士事務所，受理民眾民刑事件的業務。<sup>14</sup>此時正好也是當時的攝政宮裕仁皇太子到臺灣「行啓」的前後。

根據《臺灣人士鑑》之資料，陳增福於隔年（1924年）9月亦向東京地方裁判所（地方法院）辯護士名簿登錄，<sup>15</sup>如此一來，陳增福於臺灣、日本兩地均可執行辯護士之業務。在戰後的1960年，陳增福如同林獻堂「離臺遠走日本」（原因等等後敘），也因為擁有戰前可於日本執業的日本辯護士執業資格，而能在東京持續開業。

<sup>10</sup> 《蔡式穀行迹錄》，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5。如眾所周知，蔡式穀取得辯護士資格後，返臺於臺北市太平町開設事務所，並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政治、社會運動。

<sup>1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6日，2版。《臺日》在報導陳增福的同時，也順便提及陳增福胞弟齒科醫學士陳增全於臺北市太平町開業事，並喻為「家門之榮」。

<sup>1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月24日，2版。

<sup>1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5日，6版。陳增福迫不及待地迅速回臺，到底他有否自明治大學畢業，根據群馬大學所澤潤對陳增福兒子之一的陳定堯（前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國泰醫院、萬芳醫院病理科主任）的訪談記錄，似乎並沒有。陳增福赴東京，只是將學籍置於明治大學，付了學費並不到學校，以一年多的期間拚命努力背誦六法全書。參閱所澤潤，〈聽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V）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灣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卷，頁129～130頁。另外，根據《臺灣人士鑑》與〈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記述，均載為「畢業」。待查。

<sup>1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6日，6版。

<sup>15</sup> 臺灣新民報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年，頁25。

1926年2月，陳增福也登錄取得了「辦理士」資格。<sup>16</sup>這當中他曾以新科辯護士之青年才俊身份，接受辜顯榮發起、以對抗臺灣文化協會的「臺灣公益會」之邀，進行有關1924年1月起在臺灣開始施行的新「刑事訴訟法」的演講。<sup>17</sup>

1927年左右起，陳增福被官選為臺北市協議會會員，每屆任期二年，共連任四屆。<sup>18</sup>此時的市協議會會員雖有日本人與臺灣人的民間人士擔任，但都是官選，亦即由州知事任命；相對的上一層級的州協議會會員則由總督任命。陳增福連任四屆臺北市協議會會員後，於1934年起（此時已改名為穎川增福）擔任臺北州協議會會員。<sup>19</sup>1935年起地方行政制度大幅改革，州與市各設立議決機關的州會與市會，取代原先諮詢機關的協議會，並於該年底11月22日舉行臺灣有史以來的首次選舉（唯只選出市會議員的半數，其他半數則為官選；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議員與街庄議員互選產生，另半數由總督任命）。1935年之後穎川（陳）增福或許未投入選舉，也未被總督任命為州會議員，因此沒能出現在臺北州會議員名單上，但在1933年5月時，曾被選為臺北市辯護士會的副會長。<sup>20</sup>

陳增福在擔任臺北市協議會會員時，曾在第一回的任期中，大力主張應在臺灣立即實施「自治制」，1928年1月29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大標題「自治制を即施せよ 陳增福氏長廣舌を揮ふ」（立即實施自治制 陳增福氏長篇大論），以及「議會素描」漫畫，大幅報導此事。報導中陳增福謂：

……依照憲法所示，我本島人以臣民的權利得有參政權，但實質上卻無法取得參政權，這是因為選舉令並不被施行之故。……本島社會中堅人士幾乎不知支那時代之事，只知成為我領土以來之事。而內地人因為住在本島之故，由於本島選舉令不被施行，所以同樣不滿。觀諸今日之社會狀態，內地已實

<sup>16</sup> 同上註。所謂「辦理士」指的是依據日本「辦理士法」向特許廳申請有關「特許・意匠・實用新案・商標」等手續之代理或鑑定者，是執行產業財產權實務的「國家資格者」。不過，在日本擁有辯護士資格者即能登錄為辦理士，而且辯護士即使不登錄為辦理士，也能執行辦理士之業務。戰後日本之辯護士與辦理士均改用「弁」字，成為弁護士、弁理士。

<sup>1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9日，6版；1月16日，4版。

<sup>18</sup> 於陳增福計文「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中，記載著陳被推選為臺北市協議會會員，任期二年，連任四屆，但並未寫明自何年起。從《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29日的記事，即登載陳增福於市協議會的發表，直至1934年2月2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仍有市協議會陳增福（此時已改姓名為穎川增福）的發言記事。該年年底起穎川增福已成為州協議會會員，故推算其應自1927年起開始擔任臺北市協議會會員。

<sup>1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2月20日，夕刊4版。

<sup>2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5月7日，夕刊4版。同年蔡式毅被選為常議員。1936年穎川增福競選臺北辯護士會長，但未選上；同年之副會長改選結果，由臺灣人施炳訓與另一位日本人知念政信出線。《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19日，7版。

施普通選舉，婦人參政權被吶喊著。依此三個理由，在此合法地大聲呼籲，能早一日在臺灣施行選舉令，使內地人、臺灣人均能取得作為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的參政權，努力使議員民選，而成完全的地方自治團體。<sup>21</sup>

陳增福於1928年在臺北市協議會大聲呼籲即刻仿日本內地的普選，實施選舉，1935年不完全的地方自治選舉制終於在臺灣實施，但是陳增福本人似乎並未投入選舉的行列。

戰後陳增福曾於1947年擔任第一屆的臺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1960年5月離臺赴日，其赴日理由，根據訃文「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中的說辭是：「因公積勞成疾，以致年老體衰，必須善加療養，是故，乃整裝赴日就醫」，但接著又說「未幾即告痊癒，因思舊地重溫，頤養天年之念，遂寄留東京復開辦律師事務所，執行律師業務以迄於今」。<sup>22</sup>從「乃整裝赴日就醫，未幾即告痊癒」之辭，對照前之「因公積勞成疾」，大概可推測「因公積勞成疾」只是尚在戒嚴時期所寫的訃文中的表面理由，實際上並非如此。據陳增福媳婦陳詹月娥（陳定光妻）的口訪資料，她說陳增福會到日本（從1960年5月至1977年5月1日過世止，共17年），主要是：「他去法院不能說國語（日本話）」，「還有他看不慣臺灣的司法。他說不是對不對的問題，是在走後門的司法，他看不慣。他看不慣就去日本了。他說我再怎麼辯，就算用國語（日本話）辯也沒用，人家用錢就……」。<sup>23</sup>或許語言的問題，以及戰後臺灣司法陰暗面的問題，才是促使陳增福類似林獻堂一般離臺赴日的主因吧。

陳增福赴日後，因仍具有日本國籍（有關陳氏日本國籍事，後敘）以及在日本執業律師之資格，所以於東京大田區開設律師事務所，直至1977年5月1日過世止，享年85歲。

## 參、陳氏家族的臺北高校菁英群

陳增福家族中，共有5位子弟先後就讀日本治臺後半期的高等菁英養成教育機構——臺北高等學校，其資料如下表：

<sup>2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29日，2版。文中的「普通選舉」指的是1925年3月，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普通選舉法，取消了納稅額的限制，滿25歲以上的男子有眾議院議員的選舉權，30歲以上男子有被選舉權，但婦女參政權仍不被承認。

<sup>22</sup> 陳增福訃文「陳府公生平事略」。

<sup>23</sup>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表一、陳增福家族就讀臺北高校者

姓名	稱謂	學	歷
陳定燦	長男	建成小學→臺北二中→臺北高校(昭12理乙)	→熊本醫大
陳定松	次男	建成小學→臺北二中→臺北高校(昭11理乙)	→臺北帝大醫學部
陳定雄	三男	樺山小學→臺北高校(尋常科)	→臺北高校(昭17.9理乙)→京都帝大醫學部
陳定芳	五男	師範附小→臺北一中→臺北高校(昭19文乙)	→熊本醫大
陳定光	六男	師範附小→臺北二中→臺北高校(昭21理甲之2)	→臺大工學院

- 資料來源：1. 所澤潤，〈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V）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灣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
2. 《蕉葉會名簿》，2005～2009年版
3. 陳氏家族口述訪談

說明：表中之「昭12理乙」表示昭和12年（1937年）畢業，理乙為理科乙類，「文乙」表文科乙類，其他同。

從表一可知陳氏家族中就讀臺北高校，最早畢業者為次男陳定松，昭和11年（1936年）畢業（亦即1933年進入臺北高校高等科）；最遲為六男陳定光，戰後的1946年始畢業（之後進入戰後的臺灣大學工學院）。

在討論陳增福家族為何有這麼多位子弟能擠進當時高等教育窄門的臺北高校之前，尚須瞭解陳增福家族的情形：陳增福擁有一位臺灣人妻子，以及一位日本人太太，兩位夫人各生了9位小孩，因此他有共18名子女（男生10人、女生8人）。

陳增福於1921年9月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留學前，已經在臺灣娶了妻子莊氏食婆，育有三女（謹宇、雪金、粉）二男（定燦、定松）。到1923年3月取得辯護士資格返臺的約一年半期間，他除了將學籍置於明治大學而努力背誦六法全書準備辯護士的國家考試外，又認識了一位日本小姐，亦即他後來的日本太太松浦セン（後稱穎川ゆり）。陳增福回臺時，不但帶了一張辯護士證書，還多了一位日本妻子，以及懷抱中未滿三個月的陳定雄（穎川定雄）。陳增福如何認識松浦セン，根據所澤潤對陳定堯的口訪記錄，認為或許是陳生病住院，與身為護士長的松浦因而認識；<sup>24</sup>但據陳的媳婦陳詹月娥言，陳增福留學時住在松浦家，是房東與房客的關

<sup>24</sup> 所澤潤，〈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V）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灣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卷，頁130。



係。<sup>25</sup>無論如何，陳考取辯護士資格後返臺時，是帶著松浦氏與甫出生的陳定雄一起回來的。根據陳愛蘭（陳定松女兒）的說法：「我阿嬤（臺灣嬤）告訴我，說阿公寫信跟她講，要帶一個（女人）回來，問說好還是不好。阿嬤說，如果我跟他說不好，他一樣會帶回來，所以我乾脆跟他說好」。<sup>26</sup>

陳增福回臺後，與二位妻子住在一起，二位妻子並各再生了四位與八位小孩，合計18位。這期間陳增福也選擇了與原妻莊氏食婆離婚，再與松浦セシ結婚的方式。根據陳詹月娥的說法：「那時候日本人沒有在做小的，所以跟臺灣嬤離婚，並將現在中山北路、當時宮前町的一片土地跟房子、還有山坡地給她」。<sup>27</sup>陳愛蘭說：「或許也因自己有點內疚，阿公什麼事情都聽臺灣阿嬤的，對日本阿嬤兇巴巴的，對臺灣阿嬤就不敢」。<sup>28</sup>

陳增福雖然與莊氏食婆離婚，再與松浦セシ結婚，但是全家仍然住在一起。例如陳增福辯護士事務所後來搬到今天水路、華亭街一帶，前棟四樓後棟兩樓，前棟一樓為辯護士事務所，二樓由日本太太使用，三四樓是小孩居住，後棟一樓為臺灣太太、二樓為其較小的孩子居住。儘管分前後棟，全家還是住在一起。<sup>29</sup>

但是，陳增福與莊氏食婆離婚，再與松浦セシ結婚，其實牽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亦即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國籍」問題。陳增福到底是「娶」松浦氏？或者是以日人所謂的「養子緣組」<sup>30</sup>的方式「入贅」松浦家？《臺灣日日新報》上面有關陳增福的報導，於1931年1月起，開始以「穎川增福」之姓名予以刊登，也就是說陳增福至少在1931年1月時，已成功改為日本姓名，成為穎川增福。這在當時應該是一個很特殊的個案，亦是在探討臺灣「戶籍」或「國籍」時，非常值得注意的案例。筆者曾在拙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一書中，敘述皇民化運動期，1940年開始實施的「改姓名運動」時，提到在實施之前已有臺北州協議會會員、辯護士陳增福，早已改名為穎川增福的特例，而且其所改的姓「穎川」，正是改姓名運動中，總督府對取日本姓名的禁忌之一：「與現在的姓具有緣由的支那（中國）地名，不得作為姓使用」——「穎川」乃取自於陳姓的祖先標記「穎川堂」（穎川，中國河南穎水流域一帶）。筆者當時並不能確定陳增福何時開始改名為穎川增福，並以僅

<sup>25</sup>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26</sup> 「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4月19日。

<sup>27</sup>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28</sup> 「陳愛蘭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29</sup> 「陳美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3日。

<sup>30</sup> 所謂「養子緣組」，指的是沒有血緣關係者，形成等同親子關係的行為模式。

能取得的些微史料，作出陳氏能在改姓名運動之前即已改姓，或許是「因為陳家在早期曾經捐贈鐵路用地2,000餘坪給臺北廳使用」的錯誤揣測。<sup>31</sup>如今，已能大致確定陳增福改名為穎川增福，早在1931年初即已改名成功（或許日後再查閱陳氏戶籍資料則更能清楚瞭解確定的年月日期），而其能改姓名，並不因寄付鐵路土地的關係，而在於與日本女子松浦氏結婚的緣故。到底辯護士陳增福當時是運用了日本國哪一項法律，而能突破臺灣人與日本人通婚「入籍」的藩籬？當時戶籍法或國籍法對臺灣人的限制又是如何？此案例與「日臺通婚」法條的修改又有何關連？對這種問題，本文並無法馬上進行探討，留待日後再持續追蹤、分析探究。

不過，1931年陳增福成為穎川增福，或許代表著他已入籍成為「內地人」而不是「本島人」，而這個改變也影響到戰後陳增福能夠順利離臺赴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他赴日之前已經知道他可以用「日本國籍」的身份「返日」，而且辯護士的資格在戰後的日本依然有效，他是「回歸」的日本人，而非「歸化」成日本人。

同時，1931年從陳增福變成穎川增福，或許對「穎川」家族子弟之求學，也帶來影響，包括五位子弟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因為1931年之後穎川家族子弟們，或許可以持「內地人」的身份，與其他日本人子弟競爭臺北高校高等科120個內地人錄取名額中的一席，而非與「本島人」子弟爭取40個名額中的一個。在競爭倍率來說，成為「內地人」是相對有利的（至少倍率增為3倍），當然其前提是無論內地人、本島人，學生本身非優秀不可。

以上的「推論」尚有一些問題未解決，一是陳增福成為穎川增福是否代表陳氏及其家族成員已成為「內地人」？一是其子弟應考臺北高校時，其錄取名額是否算計在內地人學生額度內？或仍然屬「本島人」？這些細節有待未來釐清。

再回過來看陳增福家族五位就讀臺北高校子弟的情形。長男陳定燦與次男陳定松中學均就讀於臺北二中，定松小定燦一年，但依當時的規定，就讀年限五年的中學校，四年級時即可與五年級生一同報考高校，在學校老師的鼓勵下，四年級的定松與五年級的定燦一起報考，結果定松合格而定燦失敗，隔年定燦再捲土重來，也因而造成弟弟定松反而比大哥定燦早一年從臺北高校畢業（定松1936畢、定燦1937畢）的情形。二人畢業後，定松留在臺灣就讀臺北帝大醫學部，定燦則前往九州就讀熊本醫大，兩人後來均成為開業醫，定松亦到過日本長崎醫院當內科部長，定燦的兩個兒子以及定松的四個男孩，後來也繼續從事當年臺灣人出路最佳的行業——

<sup>31</sup> 參見拙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日創社，2006年，頁51~52。

醫生。<sup>32</sup>

三男定雄（穎川定雄）為陳增福日本太太松浦セン（穎川ゆり）於1923年1月在日本所生，出生後二個月被帶回臺灣的長男。陳家五位就讀臺北高校子弟中，他是唯一考上臺北高校尋常科的，4年之後順利直升臺北高校高等科，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的1942年9月自臺北高校畢業，前往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可以說是陳家子弟中最優秀的一位。但是隔年（1943年）3月為了回臺灣度假，16日從神戶搭乘「高千穗丸」豪華客輪，19日即為美國潛水艇所擊沉而殞命。<sup>33</sup>一樣在「高千穗丸」上的，還有同為臺北高校畢業在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就讀的郭維租，以及京都帝國大學醫科的楊雪樵，不過兩人九死一生逃過了劫難。<sup>34</sup>當時正是太平洋戰爭相當緊繃的時期，據言正在臺南當兵的陳定松瞭解情勢的緊張，要陳定雄不要回來，但是思子心切的日本媽媽卻想辦法叫事務所職員弄了一張船票（傳為請後來的名作家邱永漢讓出船票），陳定雄才得以上船。陳定雄的不測，也一度讓陳增福不能諒解日本太太的行為。<sup>35</sup>

陳氏家族五位就讀臺北高校的子弟中，有三位是日本太太所生，除了死於高千穗丸船難的陳定雄外，還有陳定芳與陳定光。陳定芳臺北一中畢業後進入臺北高校（第18回文乙），1944年畢業後考入長男陳定燦就讀過的熊本醫科大學，戰後留在日本，於群馬縣開業行醫。陳定光進入臺北高校時已經是戰爭末期，他和八田與一的兒子八田泰雄同班，因戰爭而縮短授課時間，終戰那一年（1945）的10月畢業，戰後就讀承繼臺北帝國大學的臺灣大學機械科，畢業後進入臺電公司工作，先後在羅東員山發電所、花蓮立霧溪、臺北烏來、粗坑、龜山發電廠擔任廠長，也曾到越南去幫忙建設發電廠，是臺電的高級工程師。陳家幾位戰前就讀臺北高校的菁英子弟，甚至包括原來讀臺北高校文科乙類的陳定芳，以及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陳定堯，後來全部選擇進入醫學院（熊本、臺北帝大、京都帝大），並成為醫生，唯獨陳定光未選擇習醫之路，成了工程師而非醫師。根據陳定光夫人陳詹月娥的口訪，這是由於陳增福認為戰爭末期「聽說不作醫生就可以留在臺灣，作醫生就要去戰場」，所以不讓陳定光讀醫科。陳增福的思慮，或許是「高千穗丸」船難事件，已讓陳家損失了陳定雄，他不願意再因戰爭而犧牲自己的子女吧。特別是陳家已

<sup>32</sup>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陳美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3日。

<sup>33</sup> 「陳愛蘭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34</sup> 參閱佛光山·中國時報寶島版合編，《還原歷史真相——高千穗丸沉船事件的回顧與省思》，臺北：中國時報，1996年，頁14。

<sup>35</sup> 「陳愛蘭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陸續入籍為「內地人」，平時得享與內地人相同的待遇，但戰時依照兵役法，役齡男子有被徵召當兵的義務，就讀醫學院者，在兵源缺乏之下，被徵調往戰地擔任軍醫，確實難以避免。但是也因為如此，讓陳定光非常不滿，為何哥哥們都能習醫，只有他不行。「每天都聽他在叨唸，說不應該聽他們的，到要過世前都超生氣的，說他一生的理想都沒達成」陳定光夫人陳詹月娥如是說。<sup>36</sup>

附帶稍微敘說未就讀臺北高校而選擇考進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陳定堯的情形。陳定堯是陳增福於1923年初取得辯護士資格，與日本妻子及未滿三個月的小孩。陳定堯中學時就讀剛成立不久的臺北三中，高中入學考時，由於臺北高等學校與臺北帝大預科的考試日期相同，他自認考試運並不太好，而且臺北高校理科乙類（未來打算進入醫學院者）又相當困難，所以選擇較易考進的臺北帝大預科（雖然幾位哥哥均進入臺北高校）。帝大預科畢業後，於1944年9月免試直升臺北帝大醫學部（戰後改為臺灣大學醫學院），1948年臺大醫學院畢業，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病理科，後為臺大醫學院、臺北醫學院教授，並曾任職於國泰綜合醫院、萬芳醫院，為著名的病理學家。<sup>37</sup>陳定堯是陳增福回臺後所生的第一個男孩，因此陳增福對他期望很深，6歲時就把他帶去跟日本媽媽一起住，要日本媽媽教他日文。也因為如此，他只會日語而不會臺語，回到自己親生的臺灣媽媽這邊要錢時，話也不會講。臺灣媽媽很生氣，說以後不讓孩子去日本媽媽那裡了，陳定堯也覺得為什麼18個孩子，就我一個寄人籬下。戰後初期陳定堯仍然不太會說臺語與北京話，他最流利的語言是日語，再來就是英語。曾就讀北醫的陳定松女兒陳愛蘭說，有一次她與也在北醫任教的叔叔陳定堯一起坐計程車，陳定堯問陳愛蘭：「妳現在要去妳的他家還是我的他家？」讓計程車司機忍不住回頭問他們到底在說哪一國語言。<sup>38</sup>陳愛蘭也提到前述的陳定光，說：「他比孫運璿還厲害，但是人家都有辦法往上爬。他（陳定光）在日本就有辦法噁哩呱啦的講話，在臺灣開會他就不講話，因為（北京話）講不出來」。<sup>39</sup>政權的轉換，也使得日語文流利的戰前優秀人才，成為折翼的菁英。

<sup>36</sup>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37</sup> 參閱所澤潤，〈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V）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灣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卷。另，「陳定堯教授事蹟」（訃文）。陳定堯（1923.12.22～2009.7.8）享年87歲。

<sup>38</sup> 「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39</sup> 「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 肆、結論

筆者自四、五年前開始進行有關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的戰前舊制臺北高等學校的研究與資料、文物蒐集，在偶然的機會中獲悉臺北艋舺陳增福家族有五位子弟曾經就讀臺北高校。臺北高校是日本治臺時期最難擠進的窄門，也是高等菁英養成學校，陳增福家族則是筆者目前為止蒐尋到的就讀臺北高校子弟人數最多的家庭。筆者因而起意，試圖追蹤陳增福家族是什麼樣的家族？他是基於什麼樣的方式，以致於能造就五位擠進臺北高校的優秀子弟？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促成他的「五子登科」？

本論文基於一些基礎史料，如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日新報》、《臺灣人士鑑》、陳氏家族相關訃文、其家族後代成員的口述訪談，建構了陳增福與其五位臺高子弟的初步輪廓。

陳家應是臺北艋舺的殷實商家與地主，靠著與中國大陸的商賈買賣而致富，但並非傳統士紳世家。四歲失怙由母親扶養長大的陳增福靠著自己的聰慧、毅力，歷經國語學校師範教育、公學校訓導、日商公司職員，而到日本東京明治大學就讀法科，並在不到一年半的準備之後，一次應考即順利通過辯護士的國家考試，回臺後開始執業並擴大其事業基盤。陳增福赴日前所娶的臺灣妻子，以及從日本夥同回臺的日本太太，各自生了9位子女，男10女8共18位。這個人數眾多的家庭，開銷雖然浩大，<sup>40</sup>但也使得陳家有足夠的男丁員數得以應考臺北高校。

陳增福的辯護士事業，以及後來擔任臺北市、臺北州協議會員，社會地位基盤的擴充，應使其子弟有更優厚的受教環境。而陳家子弟的聰慧優異，則使他們能擠進臺北高校，後來並進入熊本醫大、臺北帝大、京都帝大醫學部，逐一成為醫生（除了陳定光成為工程師），陳氏家族也因此從辯護士家庭轉變為醫生家庭。陳增福的孫子輩，如果連同陳增福的弟弟、臺灣人第一個獲得齒科醫學博士的陳增全<sup>41</sup>家人也一起計算，他們的家族三代共有十餘位醫生，這還不包括陳增福的姊姊一家。

不過，陳增福家族在發展過程中，另有一個值得關注並繼續深入研究的部分——陳增福與臺灣人妻子離婚（但仍一同生活、養育子女）而與日本妻子結婚，

<sup>40</sup> 陳愛蘭說他們家兩天就要吃掉半頭豬，燒洗澡水一天要用一簍煤，肥皂一天就會用掉一塊。「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sup>41</sup> 陳增福弟弟陳增全於1937年1月18日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通過博士學位審查，為臺灣人第一位取得齒科醫學博士者。《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月30日，8版。

這個婚姻對陳家造成了莫大的影響。陳增福於1931年改姓名成爲穎川增福，應是他身爲辯護士，深諳日本的國籍法、戶籍法，而以與日本人松浦セン結婚（或「入贅」）的方式，取得「內地人」的身份，並使其子女也一次或陸續改名，取得內地人戶籍。<sup>42</sup>此入籍問題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效應，不僅是解讀陳增福家族多人考進臺北高校的關鍵之一，也是瞭解陳氏子弟於戰爭期間是否有被徵調去從軍、當軍醫，或陳增福不願其六男陳定光習醫而改讀工科的一把鎖鑰。戰後陳增福能順利赴日定居、不必再考試取得資格，即能在東京執業，端賴其戰前的「高瞻遠矚」，早已取得「內地人」或真正日本人、日本國籍的資格。他於1930年代以後，已不是「本島人辯護士陳增福」，而是「日本人辯護士穎川增福」，因此他戰後於1960年再回到日本，並不是「申請歸化」成日本國民，而是按法律上所規定，理所當然的再回歸爲日本國籍，其在戰前已出生之子女、孫子女，也順次能取得日本國籍，只要他們願意。

除了與臺北高校有關的研究之外，由陳增福家族之個案研究，也衍生出許多與國籍法、戶籍法、日臺通婚之問題，甚至陳氏家族的經濟基礎、陳增福個人的思想、人際、行動關係（包括與總督府、臺北州廳、臺日人團體等的關係），本論文於此僅先提出初步的考察，仍有許許多多未解的課題，留待日後再逐步探究分析。

\*感謝曾道雄·陳素珍夫婦、陳美女士、陳詹月娥女士·陳秀浩先生、姜仁治·陳愛蘭夫婦提供相片、文物、資料，以及接受訪談，謹致謝忱。

\*同時謝謝臺師大臺史所研究生潘郁雯、蕭君霖協助口訪並整理資料。並謝謝徐聖凱提供網路資料。

<sup>42</sup> 根據所澤潤對陳定堯的訪談，陳定堯自稱約昭和13年（1938）才入日本籍，名字改爲穎川定堯，而此入籍或許也使得他考中學失敗二次後，能順利考上新設立的臺北三中。其家人並非一次全部入日本籍，而是陸續入籍。參考所澤潤，〈聽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V）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灣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卷，頁145。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lites in the Family of Chen Zeng-Fu and Taihoku High School

**Tsai,Chin-tang**

### **Abstract**

Chen Zeng-Fu was born in Banga (now called Wanhua), Taipei. He graduated from the Teacher Training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and after being a short-term school teacher, he went to study law in Meiji University in Japan. Then, he passed the bar exam in Japan and became a lawyer in Taiwan. Chen had a Taiwanese wife and a Japanese wife, and had changed his name to “Zofuku Eigawa” in 1931, when normal Taiwanese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obtain Japanese surnames. Chen had nine sons and nine daughters, and five of his sons successively studied in Taihoku High School, which was so called “the biggest barrier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en’s family was the only exception that could have five children study in higher schools from a single Taiwanese family.

Who was Chen Zeng-Fu? How could his family breed so many elites? And after all what do they mean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amily, and society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ould focus on the above questions, and analyze them through recorded history and oral interviews. The author also conducted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rived issues of Japan-Taiwan marriage, census register, and nationality of how Chen could get the “Japanese citizenship” and change his name to “Zofuku Eigawa” by getting married to a Japanese woman in 1931.

**Keywords:** Chen Zeng-fu, Zofuku Eigawa, Elites, Taihoku High School, Name change, Japan-Taiwan Marriage

